



歷史的暗流—— 論時代變遷下的笕橋精神

備役上校 田定忠

提 要

1937年日本軍閥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在淞滬戰役中，中華民國空軍處於相對劣勢兵力之情況下，空軍健兒以「有我無敵」、「至大至剛」的大無畏精神，英勇反擊入侵之日本戰機，獲得輝煌戰果，開創了空軍「笕橋精神」及「忠勇軍風」的組織文化。但歷經八十年的時空環境改變，原有的黨國機制、強人領黨、信仰理念均已逐步調整或式微，甚或在政治人物的主導下被迫調整而不復存在。很明顯地，空軍組織文化內涵已不復以往，面對臺灣政治民主化的調整，社會發展趨勢及兵員素質改變，空軍組織文化亦應以新的觀念、新的視野調整，期能凝聚共識，在原有「笕橋精神」及「忠勇軍風」的組織文化下，強化空軍軍人武德並發揚光大，以堅實國家空防戰力。

關鍵字：黃埔精神、笕橋精神、軍隊國家化、淞滬會戰

前 言

1937年日本軍閥發動七七盧溝橋事變，佔領平津要域，中日戰爭全面爆發，隨後於8月13日在上海地區爆發淞滬戰役，日本戰機配合其海陸軍之攻擊行動，於次日進襲我上海周邊之笕橋、廣德等基地，欲完全殲滅中華民國空軍，然卻遭我空軍健兒英勇反擊，在戰機數量及性能均相對劣勢情況下，我空軍健兒不畏犧牲，發揮「有我無敵」、「至大至剛」的大無畏精神，創造了輝煌戰績，也塑造了空軍「笕橋精神」及「忠勇軍風」的組織文化。

然「笕橋精神」的確立，有外敵入侵

的時代背景與黨國體制的環境因素，臺灣解嚴後在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的過程中，昔日威權體制中的一些重要項目消失了，而軍中年輕一代的成員在民主教育及政黨政治的影響下，普遍不再具有如先烈們的強烈黨國意識，其投考空軍的動力亦非抗戰時期先烈們所抱持的「從軍報國、殺敵禦侮」，或戡亂時期「反攻復國、還我河山」的思想與信仰，因而仍以「笕橋精神」做為今日空軍無形戰力的泉源，其精神感召效果有待深入調查及分析，並謀求建立適應時代潮流及國家體制的思想及信仰，俾能發揮空軍的精神戰力。

學術界有關以「笕橋精神」做為組織文



化研究的資料極為有限，一限於此為軍中組織文化外人難窺堂奧，二限於營區管制資料調查有實質困難，在資料闕如情況下，僅能以作者過去從事軍旅工作的經驗，及時下與軍中成員的對談，輔以對時事的觀察、社會的反應，從而獲得分析資料，在資料有限及個人主觀看法影響下，分析難免無法完全符合實況，僅能就社會及軍中產生的現象與影響，提出個人的論點。

組織文化與精神信仰

一、組織文化的形成

文化是一群人或一個社會所共同持有的各種風俗、價值、信仰、知識所表達的符號，這種共同持有的情況使生活在相同文化地域的成員，在社會經驗、文化認同和行為思考上，呈現一種相似的情形。¹換言之，文化是人類因應生存需要而集體創造出來的結晶，一個民族的文化如此，一個組織的文化亦是如此。一個民族的文化經過系統的整理之後，形成一套基本規範，反過來在民族精神生活中發生引導作用，大至國家民族的文化如此，小至單位組織的文化亦同。

國父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有云：「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透過科學方法的觀察或哲學方法的判斷而產生了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有了信仰，為實現信仰就生出力量。」

一個組織有了思想，同時對這種思想

深信不疑，因而成了組織全員の信仰，當組織全員有了堅定的信仰，則會成為強大的力量。這種因相同思想而凝聚成相同信仰的行為，最終成為組織的一種精神，是組織的一種文化表現。

對國家、政黨、軍隊、團體、企業(以上統稱組織)而言，組織文化是長年累積下來的一種傳統、習慣與特質，也是民族性及社會道德的延伸，組織文化在短時間內不易改弦易張，但卻會受到組織領導人的道德觀念及行事風格而逐漸影響及改變。

有時在組織領導人的意識形態影響下，組織文化會發展成為一種特殊的境界，它賦予組織的人們以認同、尊嚴和道德的幻象，而與現實的實質脫離。意識形態會讓人們堅信某些理論，甚至會欺騙自己的良知，冠冕堂皇地為一事提供藉口或開脫，並製造假象來自欺欺人，這種現象通常出現於社會動盪時，並造成重大變革。

中國的儒家文化是數千年來士農工商社會發展出來合乎社會倫理及體制的一種文化，三綱五常、四維八德都是中國人民在帝王專制及父系社會下生活的規範，但在近代革命浪潮下，無神論的共產主義滲透到中國，原有的社會倫理受到了衝擊與破壞，而西方自由思想及個人主義等文化的侵入，也影響及改變了百姓原來所擁有傳統文化下的價值觀。

二、組織的精神信仰

探討我國武士組織(國民革命軍)的組織

1 王振寰、瞿海源《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巨流圖書公司，2005年，頁065。

文化之前，先略述日本武士組織的文化，概因作者認為，隋唐時期日本派了大量的留學生來中國學習儒家及佛教文化，之後儒學即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講求禮儀規範及忠於集團的濃烈觀念成為日本文化的一個特點。民國初年國民革命軍成立階段的領導人物多赴笈東瀛求學，難免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加上日本與中國地理位置接近，因此社會中許多的思想或觀念亦極易產生交流，甚而相互學習與模仿。

武士是十世紀到十九世紀在日本的一個社會階級，一般指通曉武藝以戰鬥為職業的軍人，武士的精神被稱為「武士道 Bushido」，這是日本封建社會中一種特殊的文化，也是被日本民族視為完美偶像的武士階層之道德規範及終極要求，要求武士必須忠於君主，背負責任和完成責任，死亡不過是盡責任的一種手段。

1716年江戶時代日人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陣基筆錄的《葉隱聞書》確立了武士道的重要理論基礎，「葉隱」二字隱意「在君主看不到的地方也要盡忠」，要求武士以隱于樹葉後的精神來犧牲自我忠於君主，「區區一葉何足掛齒，以葉隱身乃武士無我之謂也。」²「武士道是一種死的美學—落花之美。」²換言之，必要時毫不猶豫的奉獻生命絕不偷生。此書於明治維新後大量印行，二戰時幾乎人手一冊，戰敗後為美軍銷毀禁止流通。但此書對日本的成功有著不可替代的影響力，其精神影響深遠。

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轉變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武士階層和武士制度解體，但以武士精神做為思想模式和美感的符號，卻被保留了下來，並根深於國民性格之中。

民初戴季陶留學日本回國後著有《日本論》，提及武士道總括為「仇討及切腹，仇討就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兩件事情，在戴季陶的觀點中，日本武士道涵蓋著嚴重的血腥肅殺之氣。早期外國人見到日本人切腹的整個儀式過程時，便覺得武士道是殘忍且難以理解的行為，二次大戰末期「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性攻擊，在西方人眼中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舉動。

戴季陶認為武士道講究的「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其實都不過是保衛君主、藩主及自己家族的一套做法，不算是甚麼超然的精神原則，甚至可說是一種奴道。

戴季陶在《日本論》中提到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因素，歸功於「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同時指出帶領群眾完成此事業，需要有特殊人格及魅力的領袖，或以其思想、智識警醒民眾，或以其完美的道德、堅定的意志讓人民信賴及服膺。

1878年，日本陸軍省(陸軍部)發布《軍人訓誡》，要求軍人必須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向軍隊灌輸絕對尊崇天皇的思想，還特別宣揚軍人精神三大根本為「忠誠」、「勇敢」、「服從」的武士道精神，把國民道德規範為「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兩大綱目。

2 山本常朝，《葉隱聞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02。



1882年日本陸軍省又以天皇名義發布《軍人勅諭》，再度重申軍人應絕對遵守「武士道」的「忠節」、「武勇」、「禮儀」、「俠義」、「質素」等，把武士道進一步發展為近代軍人的信條，使武士道精神披上「愛國主義」的軀殼，這種把臣民對於天皇的忠誠賦予「愛國」的意義，體現出近代的國家思想與意識。³

二次大戰前，武士道擴展為日本國民普遍道德及行為準則的規範，隨著軍國主義急速的發展，武士道發展轉化為軍人的精神倫理，同時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日本軍閥並且強調為了忠誠和榮譽，軍人直到戰死都絕不可以投降，唯有如櫻花凋謝時「唯美」一般的死去，才是對天皇的徹底效忠與服從。

武士道被轉化為日本軍人的精神倫理之後，成了效忠君主的規範，乃至於戰爭末期日本節節敗退時，軍閥為了挽救戰敗的局面，並阻止盟軍對日本本土的攻勢作戰，特別成立「海軍神風特攻隊」、「陸軍振武特攻隊」及「陸軍海上挺進戰隊」，按照「一人一機、一彈一艦」的要求，對盟國海軍艦艇編隊、登陸部隊及固定的集群目標實施自殺式的攻擊。

1908年蔣介石與陸軍速成學堂(保定軍校前身)的學生，赴日本專為中國陸軍留學生開辦的振武學校接受軍事教育三年，此期間在日本軍事教官影響下必然接觸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與觀念，這對其日後成為國家的

軍政首腦時，抱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及「士可殺、不可辱」的浩然氣節及行事風格，不可否認地除了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之外，與日本武士道文化也脫離不了關係。

在君主專制時代，賢明的君主必是人民崇敬的對象，如果輔以君主神格化的宣傳，其精神號召必會產生引領群眾的效果，群眾會自然地凝聚共識，因而形成共同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一股力量。各民族這種對君主的崇敬及效忠，在某種時空環境中，會特別的明顯。

三、國民革命軍建軍及黃埔精神

回顧歷史，民國肇建初始，軍閥割據列強環伺，國事內憂外患，國父孫中山為建立國家武力，培養健全的革命幹部，1924年1月於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時，提議開辦軍官學校創立黨軍；乃於6月16日於廣州黃埔長洲島創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親頒「親愛精誠」校訓暨開學訓詞勗勉師生，並任命蔣介石為校長，講授三民主義及傳播革命思想，因為學校位於黃埔，故又名「黃埔軍校」。

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對學生的教育除了講授三民主義及傳播革命思想外，想當然爾，為了養成學生的高尚節操及革命人格，此期間必以留學日本時接受之武士道精神，結合中國孔孟儒家傳統思想中三綱五常四維八德之美德，傳授予部屬及學生，並要求建立「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之志節，抱持「貪生怕死莫入此門，升

3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6%E5%A3%AB%E9%81%93>

官發財請走他路」之節操，為國家興亡而奮鬥，讓部屬及學生成為一支有強烈救國主義及忠君思想的軍隊。

1924年廣州商團事變後，黃埔軍校利用收繳商團的大批槍械成立教導團，國民革命軍之基礎發展由此展開，之後陸續參與棉湖、惠州之役，官兵在「不貪財，不怕死，愛國家，愛百姓」革命思想引領下所向披靡，這種沿襲中國儒家思想及吸取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軍隊文化，逐漸被轉化為「黃埔精神」。

1926年蔣介石以校長身分率黃埔軍校學生，以五百支步槍為肇基，舉國民革命軍大旗誓師北伐，其率領的已經是一支有主義、有思想的部隊，此時國民革命軍上下之間的關係，為領袖與部屬的關係，亦為校長與學生的關係，這種師生的從屬關係產生了特別緊密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因此官兵意志堅定，鬥志高昂。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勢如破竹，短短兩年之內即剿滅各省軍閥統一中國，這種軍事上的勝利與國民革命軍上下之間師生的關係有絕對的作用，這也是蔣介石的精神感召及領導魅力所致。對日抗戰期間，蔣介石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全國知識青年紛紛投筆從戎報效國家。平心而論，北伐及抗戰期間，蔣介石的無私人格及領袖魅力出眾，確實是全國軍民擁戴的領袖，此期間「黃埔精神」也成了國民革命軍精神指標的內涵，及無形戰力的泉

源。

黃埔軍校為中國近現代軍校的始祖，國軍後續創辦的各軍種學校雖然性質不盡相同，但始終源於黃埔一脈，並得益於黃埔精神的傳承。黃埔校訓「親愛精誠」即是遵循總理孫中山建軍思想制定的，是黃埔軍校的精神支柱。「親愛精誠，繼續永守，發揚吾校精神」也成了黃埔軍校校歌的歌詞。

何謂黃埔精神？1926年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安體誠撰《什麼是黃埔精神》一文發表於〈黃埔日刊〉，強調黃埔精神「是充滿著信仰並實行真正中山主義的革命軍人精神」，簡言之，黃埔精神就是為主義而英勇奮鬥的精神，之後有關黃埔精神的論述頗多，如后：⁴

一、是軍校奉行的「同志仍須努力，革命必須成功」的堅毅精神；是「不妥協，不調和，不成功便成仁」的犧牲精神。

二、是孫中山宣導的「忍苦耐勞、努力奮發」的學習精神；「一心一意為國家奮鬥」的革命精神；為民眾利益「不要身家性命」的犧牲精神；「主動活潑富於進攻」的戰鬥精神。

三、是蔣介石宣導的「服從校長，盡忠黨國，精誠團結，成功成仁」的精神。

四、是「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的兩不兩愛精神。

五、是孫中山建校初衷的「愛國和革命的精神」。

黃埔軍校為中國國民黨創建，但兩岸分

4 〈黃埔精神的內涵〉黃埔軍校同學會網頁http://www.huangpu.org.cn/hp/jx/201605/t20160504_11449973.html



治以來，「黃埔精神」也成了國共兩黨軍隊及黃埔同學會共同推崇的組織文化，然在具體內涵上卻有不同的側重，大陸側重於「愛國、革命」，臺灣則側重於「犧牲、團結、負責」。⁵

空軍建軍及笕橋精神

一、軍人人格養成教育

中華民國成立後，孫中山先生積極提倡航空救國，號召華僑與國內青年學習航空，並積極籌建空軍。各地軍政府亦紛紛成立航空單位，1924年於廣州東山創立「廣東軍事飛機學校」，此為中國空軍飛行教育之濫觴。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成立航空處，次年接收北洋政府之航空機構，為中央航空行政統一之始。1929年蔣介石擴建空軍，於南京中央軍校創建航空班，奠定國民革命軍空軍之基石。1931年航空班由南京遷杭州笕橋，次年擴設為中央航空學校，蔣介石以國民政府主席身分兼任校長躬親培育，手著「空軍訓條」與「空軍信條」，勗勉全軍官兵皆為有主義、有精神、有紀律的革命部隊。

「空軍訓條」中闡明「為國捐軀、有我無敵、冒險敢死、堅忍不拔」為空軍救國的「精神、膽量、出路、要素」；「空軍信條」則要求空軍官兵要做到「誓死報國不生還」、「要與目的物同歸於盡」、「要有不再生還的血性」、「氣節要直凌雲霄」、「膽量要至大無畏」。每當學校或部隊舉辦紀念會時，「空軍訓條」及「空軍信條」定要求官兵覆誦，對於一個充滿血性的男兒言，口誦訓條及信條時，心底必升起一種責任感，身體好似注入一股沸騰的熱血，這種由外而內的教育對人格的養成影響甚深。在革命思想教育的洗禮及儒家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下，空軍官兵的愛國思想及信仰逐漸被定型，自此，空軍革命教育得以養成，革命精神得以奠定。

人格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概念，反映著一個人的本質與特質。人格的分類總體來說，可分為健康的人格及不健康的人格，中國古聖賢認為人格的差異來自素質、環境及教養，即「性相近，習相遠」也，當一個人的人格結構在各方面彼此和諧時，即是健康的人格，否則即是分裂的人格；健康的人格

5 〈黃埔精神〉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4%E5%9F%94%E7%B2%BE%E7%A5%9E>

黃埔精神為「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要砥勵「不怕苦、不怕難、不怕死」的三不怕精神，「不要錢，不要命，愛國家，愛百姓」的信念，要「為總理、為主義、為革命」而負責、團結與犧牲的精神。蔣介石在1959年6月16日於鳳山主持陸軍軍官學校35週年校慶，親自做了對「黃埔精神」的闡示：「犧牲精神」的根源，就是「樂死的性質」，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為國家來奮鬥。「團結精神」的根源，就是「親愛精誠」的校訓，凡屬革命軍人，不但事業是整個的，榮譽是整個的，而其生命、歷史都是整個的，所以同學之間不僅是要義共患難，而且是志同生死。而「負責精神」就是黃埔同學對於實現主義，對於保衛民國，對於領導人民的責任。革命軍人的責任，就是「以建民國，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的責任，是為總理、為主義、為革命，而負責、團結與犧牲。

之養成無法一蹴而成，也無法用外在的力量於短期內強迫灌輸，必須長時間的琢磨歷練及薰陶感染，始能收其效果。

革命軍人肩負保國衛民之責，須具備健全的人格、高尚武德與崇高情操，才能無畏犧牲盡忠職守，除強化國魂、黨魂、軍魂之團隊思想外，特著重於浩氣大義及堅守信念，期能為人清白俯仰無愧，為官大忠無私無我，完成國家及人民之託付。為達此目的，在軍事學府的人格養成教育中，除了剖析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之外，也引用中外歷朝歷代偉大人物的歷史評價，來闡述人生價值與生命意義，讓青年學子建立起正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除此之外，紀律嚴整、整齊劃一的軍事教育及團隊環境也相對起了作用，在一片充滿陽剛、正氣的教育學習及生活環境下，青年學子不知不覺地即被環境感染，人格亦慢慢的被塑型。

人格養成教育主要目標，是讓一個青年學子建立「知廉恥、辨生死、負責任、重氣節」的革命人生觀及生命價值觀，養成軍人應有之「濟蒼生、安社稷」的英雄抱負，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英雄擔當。空軍信條與訓條即在期許官兵們要有「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節操及抱負，於軍校畢業後能頂天立地成為國家的柱石、民族的脊梁，期於國家民族處於艱險環境時，能力挽狂瀾扭轉乾坤，於國家民族處於生死存亡之秋時，能從容赴義為國犧牲。

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及笕橋中央航空學校創立之初，蔣介石均親任校長，在其自身

人格特質下，其必定特別重視學生們革命人生觀的建立及革命人格的養成教育，因此不論是位於大陸或臺灣的軍校，軍校畢業生均抱有強烈救國救民的志向與抱負，也因而在戰場中執行作戰任務時，均能不畏犧牲、視死如生。黃埔軍校與笕橋航校皆為革命武力陸、空軍的搖籃，亦皆由蔣介石掌校，因此笕橋精神與黃埔精神兩者之間關係密切，笕橋精神可以說是由早先建校的黃埔精神延伸而來，只是增加了空軍軍種的特性。

二、笕橋精神信仰的建立

1931年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之機，於9月18日發動瀋陽事變，為染指中國東北地區製造理由，是為「九一八事變」，次年關東軍即占領東北全境，隨即把清遜帝溥儀從天津秘密送達旅順，3月9日「滿洲國」傀儡政府成立。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後，東北全境陷落，全國譁然並要求政府對日宣戰收復失地。蔣介石當時考量「攘外必先安內」採取了妥協政策，希望藉助「國際聯盟」調停，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國際聯盟」不接受調停，從此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道路，而9月18日亦被中華民族視為「國難日」。

日本侵華燒殺擄掠的行為激起全國軍民強烈憤慨，在同仇敵愾及國仇家恨情緒下，各地青年及學生們紛紛投筆從戎，大量來自淪陷區的青年更直接加入空軍，欲為家鄉的父老鄉親報仇雪恨！但由於中國空軍不論戰機數量、戰機性能，與日本空軍相較仍處於劣勢，為了要突顯無形的精神戰力，因



此「軍民合作驅逐日寇」、「發揮以寡擊眾的精神」、「以前仆後繼的精神摧毀敵寇的暴力」等口號不斷地被運用到抗戰宣傳工作中，而這些口號也逐漸變成「笕橋精神」的內涵，抗戰中期以後「發揮笕橋精神」，也成了一句全軍上下奉行的口號。

九一八事變讓日本軍閥得逞，次年即藉故再發動「一二八」淞滬事變，於事變戰役中，日機空襲笕橋、喬司基地，我空軍飛行員石邦藩、趙普明等人自喬司機場起飛迎戰，迫使日機倉皇投彈而得確保兩基地。空戰中石邦藩失去左臂，趙普明為國捐軀。政府明令褒揚並將喬司機場改名為「普明」機場，石趙二員有我無敵、至大至剛的精神除了挽救笕橋、喬司兩機場外，對「笕橋精神」之建立已帶頭奠下基礎。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閥於盧溝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平津失守後日本軍閥認為再攻佔南京上海，中國必將投降則可結束侵華戰爭，當日軍主力向上海地區集結，淞滬地區軍事衝突已不可免，面對抗日號角響聲，中國軍隊士氣高亢。

8月4日駐周家口空軍第四大隊22中隊隊長李桂丹向全員擲杯宣誓：「我一定要在天上把日機打下來，我不曉得還能不能回來看各位，仇敵如果未滅，我就不回來！」⁶李桂丹的慷慨陳詞，大有壯士一去兮不復返，古來征戰幾人回的激昂壯志。

8月6日蔣介石發表告空軍將士書，略

以：「倭軍入寇取我平津，燒殺奸淫蹂躪我同胞，凡我同胞未有不義憤填胸，誓與倭寇決一生死，我空軍將士受國家培養之深，人民期望之切，必及時發奮以死報國，其成則造民族萬世之福利，其敗即為國家千古之罪人，我空軍緒戰之結果，實為全民族全戰爭存亡生死之關鍵，責任之重無可與比，深信我將士必能竭盡其職責完成任務，建立我空軍第一頁光榮歷史之基礎，民族興亡全在此舉，期共勉之。」

8月8日日本鹿屋航空隊由日本九州鹿屋基地移駐台北松山基地，準備配合陸軍攻勢作戰。13日日本以重兵向上海進攻爆發「淞滬會戰」，當日下午二時空軍總指揮周至柔將軍發布「作戰命令第一號」，令駐河南信陽、周家口、許昌等機場之空軍第二、四、九飛行大隊於次日下午四至六時完成進駐安徽廣德、浙江笕橋及曹娥機場。

依日人中山雅洋著作「中國的天空」所附日本軍方戰報表顯示，14日下午第四大隊兵力移防笕橋過程中，與從台北松山基地起飛進襲笕橋及廣德機場之鹿屋航空隊三菱九六式陸攻轟炸機十八架遭遇，高志航等飛行員於飛機尚在整備階段中即駕霍克三式戰機奮起迎敵，擊落日軍轟炸機二架、擊傷二架，其中一架於返航時墜毀於基隆外海，另一架勉強飛回松山基地。⁷

次日清晨日軍八八式、九四式及九六式轟炸機六十餘架再度襲我上海、南昌等地

6 中山雅洋，《中國的天空》，2007年，頁165。

7 中山雅洋，《中國的天空》，2007年，頁189。

區之機場，再次遭我空軍擊落十七架，鹿屋航空隊遭重創後，其聯隊長海軍航空大佐石井義切腹自殺謝罪，這兩場空戰粉碎了日軍「三月亡華」的妄言，「笕橋」一詞瞬時名聲響遍全國，空軍健兒的英勇精神也進一步激勵及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日的決心與激情。

依「中國的天空」及「淞滬會戰-1937年中日813戰役始末」兩書記載，9月4日時，空軍第二大隊第諾斯諾普2E機轟炸機多架在第四大隊驅逐機掩護下，自安徽廣德機場起飛前往佘山及白龍港轟炸日本船艦，飛經上海東南端之南匯時，沈崇誨及轟炸員陳錫純所駕駛之904號機為日軍砲火擊中，已無法飛返基地，沈崇誨決定以身殉國，遂瞄準日艦衝撞，沈陳兩員殉國，沈崇誨此舉為亞洲第一位以飛機撞艦犧牲者⁸。

淞滬戰役是中國空軍與日本空軍大規模的接觸，中國空軍在「勢不如人、力不如敵」的劣勢環境中，充分展現了「有我無敵、至大至剛」的氣魄與勇氣，殲滅了來犯日機。這種有我無敵奮戰到底的氣魄與精神，逐漸成為空軍官兵抗敵的決心與信念，也逐步成為空軍的組織文化。

國民政府為了彰顯空軍在淞滬戰役中的勝利與英勇表現，1940年政府採納蔣夫人宋美齡之建議，明訂8月14日空軍勝利紀念日為「空軍節」。

三、笕橋精神信仰與戰力發揮的關係

日本侵華初期空軍尚在初創階段，有形的戰力極為有限，面對日本強敵的侵略，空

軍為了要教育官兵發揮視死如歸的精神，特於笕橋中央航校內豎起一座精神堡壘，以銅鑄字體書寫著對空軍官兵期許的標語：「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除此之外，校區內亦隨處可見「你有為國犧牲的決心嗎？」的標語，此種強調以自殺式攻擊的殉國行為，實因中國當時的兵力相對弱勢，唯有發揮以寡擊眾的精神及強化無形戰力，期能讓敵軍膽顫而放棄侵略。

這種以犧牲小我性命而採取自殺式攻擊，獲取最大戰果並展現愛國的精神，與日本武士道「效忠君主，願意為國家犧牲奉獻性命」的精神，有著若干相似之處，而這種自殺式的作戰方式，也是劣勢兵力對付優勢兵力的手段，企圖以此發揮震懾效果。

然以不對稱戰術達到傷害對方和宣傳信念的手段，古今皆然。二戰期間日本神風特攻隊、德國自殺攻擊隊，近代蓋達、伊斯蘭國、博科聖地、塔利班及哈馬斯等組織的自殺炸彈攻擊皆屬之，它們有些是源自民族的性格、宗教的信仰、愛國主義的思想，有些則是源自不對稱戰爭的戰術之需求。

空軍以弱勢兵力對抗日本強敵，發揮以寡擊眾、以弱敵強並近乎殉道的精神，在抗日戰爭各次空戰中不斷地上演，因而逐步強化為空軍組織的文化與精神，並從此載入史冊。

空軍文化是中國空軍建軍以來累積的傳統、習慣與特質，這個文化有一部分是空軍

8 《淞滬會戰》戴峰、周明，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13年，頁244



獨有的特質，但大部分仍是陸海空三軍共同的文化特色，⁹因為國軍部隊文化起源於黃埔軍校的國民革命軍，因此空軍文化脫離不了「犧牲、團結、負責」的黃埔精神。

抗日戰爭慘勝之後國共隨即爆發內戰，國府失利政府播遷臺灣，在防範及圍堵共產赤焰席捲臺灣情況下，政府積極建設及強化防衛力量，雖然共黨軍隊已控制大陸，蔣介石仍未放棄反攻的希望，積極透過美國力量改造軍隊整軍經武，而軍人也成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仰賴的力量，因此蔣介石對軍人格外照顧與關懷，尤其對空軍飛行部隊之成員更是關愛，這種中國儒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禮為前提的君臣關係，讓組員存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感及使命感，他們認為自己是蔣介石的天子門生，因此為了黨國的反攻復國事業，他們對任務的付予及遂行責無旁貸，願意移孝作忠犧牲小我的生命，完成黨國交付的使命。

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初期，國軍空軍飛行部隊的飛行員籍貫背景幾乎是內地省份，這些飛行員在黨國政治教育及家族落難亟思返鄉的影響下，普遍仍有反攻復國收復河山的強烈念想，在「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傳統文化的忠君思想及觀念下，因而無怨無悔效命政府的反攻政策，此時飛行員在內心骨子裡只有一個信仰，就是「效忠領袖、服從領導、追隨政府、反攻大陸」。

1958年8月23日中共砲擊金門，企圖奪取

金門後攻佔臺灣，面對背水一戰的態勢，我空軍健兒於大陸沿海的多次空戰中，再次發揮忠勇無敵的奮戰精神，終以31比1的輝煌戰果痛殲中共空軍，徹底粉碎中共武力犯台的圖謀，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創建了屹立不搖的宏基。此一振奮人心的光輝史頁，不僅是筧橋精神的再現，更延續了空軍犧牲奮鬥、戰無不克的光榮傳統。

此期間，我空軍「黑蝙蝠」及「黑貓」特種飛行部隊更因國家戰略情報的需要，抱著「移孝作忠」及「捨我其誰」的大愛胸懷，不斷地單機深入敵後執行戰略偵察及偵照任務，雖然犧牲慘烈，但組員仍然秉著「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的人生價值，及「前仆後繼，捨我其誰」的革命情操，以完成任務為職責。

分析空軍官兵「前仆後繼，捨我其誰」革命情操及犧牲精神背後的因素，不乏時代的背景、國家的處境、領袖的魅力、組織的使命、人格的養成、社會的期待及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等等。

臺灣民主制度對信仰的變化與影響

一、制度對信仰的影響

1958年八二三戰役之後至1987年臺灣宣布解嚴、1991宣布中止動員戡亂及1996年實施民選總統，時間長達三十年之久，此期間經歷了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5年蔣介石

9 《國防政策評論》第三卷第二期，鍾堅，〈從國軍文化看空軍再造〉，二〇〇二／〇三年冬季論文。
http://www.taiwanus.net/Taiwan_Future/national_defence/2002/03_02/03_02_14_01.htm

逝世、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80年起臺灣民主運動抗爭激烈、1986年民主進步黨成立、1988年蔣經國逝世，自此象徵威權統治的時代結束，而臺灣人民對國家的認同也開始產生變化。

1990年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後，兩岸開始通郵通商通航，人民可以相互進出遂行參訪交流及觀光旅遊等，隨著兩岸政治環境的變遷，營造了兩岸看似和平的環境，超過半個世紀的國共政治鬥爭與軍事對峙，突然有煙消雲散的錯覺。

隨著在兩岸政治環境的改變，中華民國政府擱置了1991年訂定的「國家統一綱領」，繼而於2006年宣布終止適用，2008年更宣示「不統、不獨、不武」維持現狀的阿Q政策，取代了國家終極統一的目標與立場。

與此同時，臺灣人民逐漸承認中共擁有中國主權的事實，並接受臺灣是個主權獨立國家的觀念，但在中國國民黨的抽象大中國意識與民主進步黨的實質臺灣本土意識，兩股意識形態仍然交相碰撞，使得臺灣地區的人民產生國家認同的錯亂，而無法凝聚共識與力量，這也使得負責國家安全及確保國家主權的軍隊成員產生「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惘。¹⁰

綜觀各國用選票當選的政治明星雖擁有人氣，但卻多不具領袖氣質與魅力，如其個人具有黨派特殊的意識形態或與全民扞格不

入的價值觀，則國人更不可能在其領導下凝聚統一的思想及統一的信仰。尤其是國家民主化之後，政治人物的一舉一動均成為人民檢視及批判的對象，在資訊爆發的環境下，貴為總統、部長的一言一行，擁護者及反對者各有議論，國民對無領袖魅力的上位者更是鄙視，近年來這種現象在臺灣尤甚。

1950至1986年國民黨主政期間，報章雜誌的報導都是經過嚴格的審查後始能刊登，在政治方面軍民所接觸的都是擁護黨國及批判共黨的文章，在黨國思想的教育下，人心普遍單純，觀念亦趨一致，但在臺灣政治體制民主化的進程中，大量的資訊充斥媒體，廟堂中正反的聲音開始衝撞，臺灣社會中原來堅固的價值觀開始瓦解。

而臺灣經濟發展的結果使社會上充斥著功利與自私，原有的「完成大我、犧牲小我」、「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等等的犧牲奉獻精神逐漸淡薄，年輕人對國家安全的觀念與熱誠也開始式微，當被問及奉獻相關問題時的回答多是「我傻啊？」更遑論抱持先烈們曾經「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的情懷。

在政府逐步調整國家定位與兩岸關係的過程中，對以武力確保國家主權及安全的軍隊產生了困擾，最明顯的就是產生「誰是敵人？」、「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迷惘，當過去建立的「為中華民國存續而戰」信仰突然鬆動甚至消失了，但有關國家定位

10〈戰後臺灣民主化的歷程〉，張炎憲，2004年3月18日演講資料。<https://sites.google.com/site/yanxian1947/yan-jiang-gao/zhanhoutaiwanminzhuhuadelicheng>



的新論述卻未確立，面對這種窘境，國軍如何凝聚統一的信仰及產生精神力量，頗值深入研究。

解嚴後政治人物、政客及媒體時事評論員煽動人心的言論，矇蔽了國民的良知判斷，也矇蔽了國民的憂患意識，對假想敵中共的軍事崛起若非酸言酸語就是冷嘲熱諷，輕敵心態極為明顯。而時下的年輕人在近年來發生於軍中的多起事件之後，對選擇軍職做為生涯規劃的意願也大幅跌落，而對過往的國共鬥爭歷史也是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很明顯地對國家安全也漠不關心，在臺灣青年身上已看不到「憂患意識」，看到的幾乎是「忘戰」。

另一值得觀察的現象為年輕人大幅降低從軍意願，依據2016年11月27日〈自由時報電子報〉報導政府力推年金改革政策，除引發退休軍公教人員反彈外，也已使有志從軍的青年卻步。¹¹2017年2月15日及3月1日〈聯合新聞網〉報導，三軍官校2016年招生出現警報，並首度舉辦第二次招生，但情況仍然不佳，聯合新聞網指出這是民主進步黨執政後軍方招生與軍士官招募最慘不忍睹的一年。¹²

此種招生與招募不足的現象，說明了年輕世代在政府「轉型正義」大旗下一連貫的

退撫年金制度改革，已讓年輕人不願意在未來生活無保障情況下投入軍旅，而已在營服務者則亟思不如歸去，臺灣在民主制度及政府短視情況下的民心反應，已明顯失去向心力及凝聚力，出現嚴重的憂患意識危機。

2011年《天下雜誌》對臺灣地區十二至十七歲的青年做了「公民教育」調查，發現時下「犧牲小我」傳統價值已不如上一代，當被問到「國家和他國發生戰爭時，願不願意自己或家人為國家上戰場？」僅有38.7%的回答「願意」，回答「不願意」的高達44.3%，顯示傳統公民義務中的「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及「絕對服從的公民情操，不再是年輕人心中不可撼動的價值，過去單向的宣傳與說教，已無法讓年輕一代照單全收。¹³

在多次利用營區開放或參訪時，曾經與年輕的飛行員訪談，當問及「如果國共發生戰爭，第一考量為何？」對方的反應讓人驚訝與深思。對方會先反問「我們的對答用於何處？相關文章發表是否指名道姓？」「你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年輕一代的飛行員會有如此的反應，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軍隊國家化之後，他們沒有背負黨團的奮鬥目標，黨團對他也沒有考核及約束的力量，他在職時只要遵守三大信念即可，一旦有戰事發生，在條件許可下他也可以選擇離開迴

11 〈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56009>

12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40/2286336>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6840/2313899>

13 天下雜誌社，《天下雜誌》網站調查資料，2011年11月28日<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28243>

避戰事。

《戰國策·趙策一》云：「士為知己者死」，忠孝節義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因此中國古代為了保全忠孝節義而捨棄性命的忠臣義士、仁人俠士不計其數，他們對人生價值的衡量完全以精神為標準，一生甘願為理念和正義割棄自己的利益或獻身捨命。

臺灣早年專制威權時代，職業軍人普遍具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價值觀，他們絕大部分出身於黨國軍校，領袖蔣公又為軍院校長，在完整的革命人格養成教育及儒家傳統文化熏陶下，個個都自認是領袖蔣公的天子門生，而他們的生死榮辱也備受蔣公所器重，因此為了君王的天下事，他們執行黨國交付的任務從不考慮個人的生死。

最明顯的就是黑貓與黑蝙蝠特種作戰飛行部隊的組員們，在蔣公殷殷垂詢、召見、關懷下，這些組員幾乎不知有小我，也不知有生死，因而犧牲慘烈，確確實實服膺了「筧橋精神」。

然而當臺灣政治進入民主化之後，政治人物多為政客或草莽出身，對軍國大事不甚關心，且生平亦未經過戰爭的蹂躪與荼毒，因此並無「養兵千日，用於一時」的觀念，亦漠視了軍人是和平捍衛者的認知，對執干戈衛社稷的軍人不再重視，甚者輕蔑藐視，一般百姓也呼應著而冷嘲熱諷，使充滿一身浩然之氣的軍人普遍感受到被踐踏及羞辱，在尋不到「知己者」的情況下造成士氣低落，甚至有大嘆不如歸去之情形，也間接的降低了青年從軍的意願。

尤有甚者，國家領導者竟對國家定位提

出否定，讓軍人產生「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疑慮與迷惘，連軍方《青年日報》行之多年刊載於報紙中縫的「國軍信條」，在2007年8月之後從「為何而戰－為中華民國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中華民國的百姓安全福祉而戰」，改成了「為臺灣的國家生存發展而戰；為臺灣的民主自由而戰；為臺灣的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目前青年日報上國軍信條為：為何而戰，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為誰而戰，為臺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民主進步黨執政時，大力推行「去中國化」、「去中華民國化」，並推動以「臺灣」名義建國入聯，但當中國國民黨取得執政權時，執政高層宣示「不統、不獨、不武」政策，未堅持國家終極統一的立場，這讓百姓產生到底是應為中華民國而戰，還是要為臺灣國而戰的紛擾。因此在國家定位不明、家國觀念淡薄、思想混亂信仰迷失的窘境下，加上經濟活動下的功利主義盛行，許多軍人已不再有堅定的犧牲小我之思想，因此在社會變遷及領導人的影響下，軍中過去的一貫信仰正在鬆散，組織文化正在質變。

二、軍隊國家化的影響

1949年政府遷台後，蔣介石吸取內戰失敗教訓重新整頓軍隊，並重申繼承黃埔建軍的優良傳統，1952年參照美國西點軍校校訓，建立國軍「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的軍人五大信念，1959年更訂頒「國軍教戰總則」，期能堅定軍人武德及強化必勝信念。

自黃埔建軍以來，蔣介石即與國軍休戚



與共、密不可分。在蔣介石領導下國軍不論東征、北伐、剿共、抗戰、戡亂諸戰役，無時不為中華民國之生存發展而戰，國軍也有著明顯的黨軍色彩。因此當1959年駐防金門大膽的北山部隊發起以軍作家運動時，即尊奉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之父」，這使五大信念中的「領袖」有著強烈中國儒家文化中的忠君思想及家父色彩。此一尊號在臺灣民主運動化中，遭反對黨及自由派人士不斷地批判，隨著臺灣的民主化及軍隊國家化的變革，2007年6月取消了五大信念中的「主義、領袖」兩項信念，從此國軍完全脫離了黨軍的色彩，相對地也脫離了強人領軍的外殼。

軍隊國家化後，原先的思想教育不斷地被檢討修正；以精神標語為例，不論國家處於承平時或戰爭時期，思想感化及愛國意識皆得靠教育、文宣強加於國人身上，以建立國人的憂患及敵我意識，對執干戈衛社稷的軍人來說，更是要不斷地教化及薰陶，讓軍人從人格及品性上自然地流露效忠國家的操守，在膽識及觀念上自然地表露有我無敵的氣魄與熱誠。

八年對日抗戰期間，中國大陸不論城鄉處處可見對日反抗、激勵人心的精神標語，加強了國人同仇敵愾的心理。解嚴前臺灣三軍各營區或政府機關、學校、眷村等處所也是無處不見反共精神標語，潛移默化的健全

國民的革命人格素質，也直接了當的嚴密國人的心防，包括軍人堅決的反共認識。

早年，各空軍基地普遍可以在建築物顯目處看見「發揚忠勇軍風」等等提振士氣的標語，這種標語隨時提醒官兵過去的光輝歷史與眼前的責任使命，對官兵的觀念具有潛移默化的教導與薰陶作用。然在「軍隊國家化」及「去中國化」的政策影響下，這些具有黨國符號的標語正在悄悄消失。走訪幾處空軍基地，發現除空軍官校營區尚有張貼標語外，多處基地均已不復見，¹⁴僅於辦理營區開放或紀念活動時才見張貼，諷刺的是會後所有標語及看板一併清除。

軍隊國家化的變革由李登輝開啟其端，陳水扁賡續執行，拔擢軍事將則依照下列條件來執行。第一，少用具有強烈中國認同的人，多用表現臺灣本土認同的人；第二，少用死忠擁護國民黨的人，多用具備改革想法的人；第三，少用堅守傳統部隊信念的人，多用表現出較高彈性的人¹⁵。在這種用人政策下，被拔擢的將領難免察言觀色附和喜好，軍方的主政者在層峰的暗示下取消了五大信念中的「領袖」及「主義」，這意味著建軍百年的軍隊放棄捍衛「三民主義」的信仰，也意味著放棄「效忠領袖」的信仰，在主政者的政策變革下，臺灣軍隊一步步脫離了國民黨的控制，也一步步的國家化，但不可否

14 2007年2月15日協請空軍作戰指揮部電話查詢，岡山、台南、嘉義基地尚有標語看板

15 〈臺灣軍隊國家化的歷程〉，楊照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hl=zh-TW&sl=zh-CN&u=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113611&prev=search>

認的也造成穩固的基石開始崩解。

毋庸置疑，軍隊國家化雖然是民主國家的常態，但國共兩黨內戰的鬥爭並未實際結束，兩岸的政治敵對仍然存在，中共「完成統一祖國」的使命也依然存在於其憲法施行的序言中，因此，在軍隊國家化的要求下，過去黨國制度下堅實的信仰正快速的被摧毀，而能適應潮流的新信仰卻未被建立起來，國軍被迫拋開過去的包袱，卻又不願割捨過去的榮耀，因此在青黃不接的氛圍中處處顯得隔閡，也顯得尷尬。

更甚者，執政者或政客為了籠絡選民，經常藉機製造軍民的對立，並做出一些戕害軍心的處置，這些看似滿足民意或因應潮流的作為，斷傷了老一代軍人的心，而年輕一代的軍人則看在眼裡，縱使曾經抱有「投筆從戎、報效國家」的熱忱，也正一點一滴的流失，加上國家認同的問題懸而未決，成員思想開始渙散，信仰也開始瓦解，這種時代變遷及意識形態改變之影響，快速席捲改變了軍隊原有的組織文化。

臺灣政治民主化之後，彰顯強人領導的圖騰被移除了，具有強烈思想教化的工具被刪除了，染有黨國色彩的忠誠教育被限制了，甚至在「去中國化」及強化本土意識下，一些發生在大陸地區的抗戰或殉國事跡，其紀念活動也故意被遺忘了或簡約辦理，在本土化的大旗下，昔日英雄或烈士對黨國忠誠的事跡正逐漸地被抹除。

反觀大陸卻不斷地擴大辦理中華民族為

生存而奮鬥的紀念活動，並大肆興建紀念館或紀念碑，藉反侵略戰爭的故事昭告國人及世人，並爭奪共產黨主導的話語權，假以時日生活在臺灣的年輕人又有幾個知道真正的歷史，及壯烈歷史背面的涵意。

三、笕橋精神存續與創新

在臺灣政客處心積慮運作下，昔日被嚴厲批評軍隊「服從領袖、效忠領袖」為愚忠行為及個人崇拜的神話不再了，軍人原有的忠於黨國信仰及信念也跟著消失，而原本隨蔣介石渡海來台具有強烈大中國意識與大一統觀念的一代逐漸凋零殆盡，軍中骨幹取而代之的是八〇年代之後才在臺灣出生及長大的新生代。

依據空軍官校期班畢業人員資料，1970年以前幾乎全為大陸省份人員，之後台籍人數逐年增加，近年來有期班甚至高達九成以上。¹⁶而臺灣政治民主化之前，軍方飛行員幾乎全為國民黨黨員，對黨國必須絕對忠誠，政治意識也必須清楚，然臺灣政治民主化之後，軍方對成員之黨性已不設限，因此飛行部隊中的部分骨幹已沒有上一代那麼清楚「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信念，也沒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漢賊不兩立」的強烈政治意識形態與觀念。

更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這些飛行員，有一部分是大學畢業後報考空軍官校的「飛行常備軍官班」，經過一年半飛行學術科訓練後，即分派至飛行部隊服役，這些年輕的軍官並未受嚴謹的軍事及黨國人格養成教育，他們

16 空軍官校27期-90期班畢業人數與籍貫統計表



的人格教育都是在充滿自由及民主風氣的大學中養成，不可否認其思想與觀念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及自由思想，缺乏嚴密團隊組織中必須具備的向心力及凝聚力。

1980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在1994年課綱「去中國化」政策下，他們接受的文化和國族認同教育與之前的世代不同，因此在思想、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完全不同於父輩或祖輩，年輕人對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移孝作忠」等觀念漸趨淡薄，甚至在自由派人士批評為陳腐的愚忠思想影響下，年輕人也逐步調整效忠的觀念及想法。

嚴格而言，這些進入空軍官校就讀的年輕人，在沒有經歷外敵入侵或國家危難的環境下，有幾個人是抱著「救國救民」的抱負而投筆從戎的，殊值玩味，不可否認多數是為了自己翱翔藍天的夢想而來，並於役期結束後迅速轉換跑道。

更甚者兩岸開放後臺灣人民可自由進出大陸地區，大陸也積極向臺灣各界招攬人才，空軍一些飛行員更在役期結束後，直奔大陸的民用航空公司，在同儕仿傚及生涯規劃等等理由的美化下，這些曾經於學生時代接受「笕橋精神」教育及洗禮的軍人們，其思遷意念的萌生絕非於役期結束後才萌芽，有些於役期內時即已撥定算盤，只是等待退伍時日而已，因此不可否認「發揚笕橋精神」、「發揚忠勇軍風」已淪為部分成員於軍旅生涯期間虛應的口號。

前文提到思想及信仰的建立必須靠教育來教化，也必須靠環境來薰陶，教育強加

灌注是首選，環境耳濡目染是其次。以空軍而言，除了空軍官校仍保有一些「發揚笕橋精神」、「發揚忠勇軍風」的標語外，一般營區及作戰基地幾乎不復存在。而當年烈士忠勇抗敵的故事，除了少數一些官兵被授意研究之外，一般官兵也幾乎少有關心，很明顯地在這種環境下，「笕橋精神」、「忠勇軍風」已淪為紀念活動不著邊際的口號，及軍事論文寫作不切實際的浮詞泛語，大家感情空洞相互虛應故事一番，昔日軍人那種充塞於天地之間的浩然之氣，及繫黨國安危於一身的英雄擔當，仍有多少存於缺乏黨國反共教育及革命人格養成教育的新世代軍人身上，殊值玩味，也殊值研究。

時代在變、社會在變，人們的觀念也跟著改變。二戰後日本在民主化及資本化的社會變遷下，日本武士道「忠君」精神從形式上遠離了當代的日本人，但卻保留了「犧牲奉獻、團結一致」的傳統精神與思維模式，並被成功地引用至國家利益上的商業運作，也成為了日本商業組織追求極緻的文化。

就我國空軍而言，面對臺灣社會快速變遷及國家認同的複雜狀況下，如何建構官兵正確思想及信仰的教育實為刻不容緩之努力方向，尤其是面對社會「去中國化」的批判環境下，必須審時度勢檢討，突顯「黑蝙蝠、黑貓」中隊成員為中華民國國祚及為臺灣淨土，所抱持的大我無私情操及為國犧牲奉獻精神，在「國家、責任、榮譽」軍人信念下，充實官兵精神教育的內涵，俾能強化空軍官兵的人格養成，厚植精神戰力。

結 論

空軍在過去二十年陸續完成新一代兵力整建後，在硬體建設上有效提升整體戰力，成為現代化、專業化的空防勁旅，為台海安全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但相對地，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假想敵中共，其海空兵力已可投射到第一島鏈，不論戰機的數量或性能，正向軍事強國邁進及發展，明顯地兩岸空中軍力態勢已朝中共傾斜，而其軍人在「中國夢、強軍夢」的感召下，正昂首為國家的崛起而驕傲振奮。

反觀我國，在本土化政策及民粹主義的政治操弄下，政黨及君臣民之間彼此攻訐不斷，「去中國化」更加深了世代之間的觀念衝突，國家認同深深地困惑著年輕的世代，不可否認眼前國人在凝聚力及向心力上出現了極大的問題，相對地，軍人面對著觀念衝突與價值觀的環境改變下，在凝聚力及向心力上也逐步鬆散甚至有瓦解的癥候。

面對中共的優勢兵力及從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國家統一的企圖，空軍在國家定位不明、政黨政治體制、民主的社會環境等等的變遷下，仍必須仰賴堅定的思想及信仰，期能以精神戰力強化硬體戰力，在思想教育方面必須以新觀念、新視野、新格局來面對國情體制發展及社會變遷，設法提升官兵憂患意識及同島一命、同舟共濟的新共識，踵武前賢在原有的「筧橋精神」光榮傳統下精進

淬練，始能做維護國家主權的堅實後盾及國土安全的堅實力量。

參考文獻

- 一、山本常朝，《葉隱聞書》，中國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 二、空軍總部，《空軍八一四60周年專輯》，台北：空軍總部編印，1997年。
- 三、洪維揚，《一本就懂日本史》，台中：好讀出版公司，2017年。
- 四、何邦立，《筧橋精神，空軍抗日戰爭初期血淚史》，台北：獨立作家出版，2015年。
- 五、天下雜誌社，《天下雜誌》網站調查資料，2011年11月28日。
- 六、賴泰安，《少年飛行兵》，台北：楓書坊文化出版社，2014年。
- 七、中山雅洋，《中國的天空》，2007年。
- 八、戴峰、周明，《淞滬會戰》，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13年。

作者簡介

田定忠先生，空軍官校56期(64年班)，國防大學空軍指揮參謀學院75年班、戰爭學院84年班，曾任職飛行中隊長、基勤大隊長、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空軍戰略組教官、國防部作戰計畫次長室聯合作戰處副處長，2004年空軍上校退役，著有「藍天神鷹」、「長空戰矛」。